

武昌县志卷四



430200

前 言

文史資料工作，是政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項促進祖國大團結、大統一，進行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並惠及後代的重要工作。由於掌握近、現代第一手史料的人，多數年逾古稀，搶救史料，刻不容緩。為此，縣政協於一九八四年成立後，我們遵照周總理“把親身經歷記錄下來傳之後代”的倡導，組織黨內外閱歷豐富的老同志撰述文史資料。經過兩年來的征集，選用了二十七篇，編為《武昌縣文史資料》第一輯，現在本書和讀者見面了。《資料》的出版，是與縣委、縣政府的關懷、市政協文史辦的指導和有關部門的密切配合以及各界人士的撰稿分不開的。對於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謝意。

本期所選用的資料，大部分是作者亲历、親見、親聞。在整理時，我們雖經多次核對，力求翔實、準確，但由於經驗不足，水平有限，時間倉促，缺點錯誤在所難免，懇請各界人士和廣大讀者不吝賜教，幫助我們改進工作。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武昌縣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

- 回忆周总理的接见……………陈传英 (1)
- 李先念同志在豹澥小桥……………黄显金 (3)
- 策反记……………许大鹏 (6)
- 抗日战争中的梁湖大队……………李飞鹏 (34)
- 在土地堂的一次清匪战斗……………金 锋 (43)
- 清匪反霸中的豹澥暴乱事件……………李明炎 马志堤 (46)

爱国有心 报国无路

- 记留法归国穷途自杀的工程师郝贵林……………舒 成 (50)
- 怀念先父熊子民……………熊增慧 (62)
- 大资本家赵典之的发家史……………赵舜琴 (68)
- 回忆我的父亲张念之……………张菊生 (80)

张轸第十九兵团在武昌县起义的经过……………陈德达 (89)

- 袁四正立功反正记……………金龙章 (100)
- 中山舰金口遇难目睹记……………于 泰 (104)
- 北伐贺胜桥之战……………武 文 (106)

- ✓ 回忆武豹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牛明候 (111)
- 张之洞与江夏县的建设……………丹 滔 (120)
- ✓ 解放前的豹澥邮政代办所……………黄昌渭 (123)
- 金水闸修建史略……………徐才高 (127)

江夏名人熊廷弼.....张良斌 (130)

烽火弥漫的鄂南中学.....安士忠 (135)

武昌县简师在解放前夕的护校斗争.....魏汝霖 (139)

私立山坡勤思初中始末.....余遂生 (142)

抗日时期国民党武昌县政府的变迁.....石 钟 (145)

武昌汉奸县长陶敦礼.....周官文 (149)

我所知道的匪首周筱山.....董之生 (155)

日寇在纸坊的暴行.....柯美贤 (161)

武昌县的风景名胜.....任 平 (164)

巧计抓“狐狸”.....周文达 (171)

小资料

武昌鱼.....武 文 (154)

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

一回忆周总理的接见

陈传英

每当想起周总理当年在五里界视察工作时，接见我这个普通女营业员的幸福情景，心情总是久久不能平静。

那是一九五八年四月的一天，万里晴空，到处呈现出一派欢乐的景象。清晨，我正在营业室精心接待顾客。忽然，街上传来欢呼声：“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听说周总理来了，我赶紧跑出柜台，顺着欢呼的人群望去，遗憾的是，周总理的小车已经一溜线地开过去了。听人们说周总理可能是去视察锦绣大队的试验麦地，我真巴不得一步飞到总理的身边去看看他老人家，怎奈我营业工作在身，不能如愿，可我此时心潮翻腾：“总理他老人家日理万机，还挤出时间到我们这里来视察，这真是我们五里界人民的福气。”

上午十点，意外的喜事降临了，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外宾视察了锦绣大队的试验麦地后，神采奕奕地来到了我们粮油门市部。当时，我激动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不等我迎出柜台，总理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顿时，一股幸福的暖流在我全身沸腾。我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只知拉着总理请到里面坐，总理却风趣地说：

“你这柜台就在群众里面，这里不就很好吗？”说着，他老人家坐到了我们自己做的简易板凳上，喝着我们给泡的茶。看到总理这样和蔼、慈祥，我那拘谨不安的心情一下就全消失了。接着，周总理亲切地询问我的名字、工龄、工资、婚姻和工作情况。当总理听说我十七岁参加工作，现在已四年工龄，担负一千二百万

斤粮食征购发款和三千六百名城镇人口的粮食销售任务时，他老人家连连点头，伸出大拇指说：“一个小姑娘能干这么多事，妇女真是顶了半边天。”他还鼓励我，要努力学习，听党的话，全心全意把服务工作做好，他一边说，一边拿出一枚金光闪闪的“和平鸽”纪念章，站起来往我身上佩戴。我看到总理站起身来，急忙上前去扶住他老人家，并伸手去接纪念章。总理用温暖的手把我的手推开，亲手佩戴在我胸前。这时，我再也抑制不住感情的狂澜，激动的泪花止不住的往外流。我深深的感到，这是敬爱的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广大妇女的鼓舞和激励。快十一点钟了，周总理还不顾疲劳的视察了我们的粮油商品、服务设施、仓库设备，询问了农民生活的安排和政策的执行情况。临走时，总理还亲切教导我们：要贯彻好“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把立足点放到农业上来。

二十多年来，总理的关怀与教导一直成为我前进的巨大动力。我遵照周总理的教导，积极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各级党组织的培养和教育下，逐渐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成长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我所在的城关粮管所，这些年来，成绩显著，被称为群众的贴心店，一直是县、地、市财贸战线的老红旗单位，先后二十一次出席省、市、地、县的财贸先进代表大会，并受到省人民政府的嘉奖。

李先念同志在豹澥小桥

黄显金

一九五三年仲秋的一天，金色的阳光洒在复苏的豹澥区小桥上，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明净。那天，这个乡村小镇的一间简陋的粮食仓库，呈现出不寻常的气氛。当时担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的李先念同志，正在仓库里主持着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我作为会议保卫人员之一，亲眼看到了李先念同志为着党的事业不辞辛劳的动人情景，至今回忆起来。心情还很不平静。

我担任会议保卫工作是从开会的前一天开始的。那天清晨，区政委赵金印同志派通讯员小张要我迅速赶到他那里去。小张说：“赵政委要你快去，越快越好！”是什么事这样急呢？我以一个区公安助理员的责任感，用最快的速度来到政委的房间。刚跨进门，赵政委就将我介绍给一个身材魁梧的同志，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南公安部的保卫干部。赵政委根据这位公安干部的布置，向我交待了一项紧急任务：①与隆城乡的农会主席李德平一道，将区里的桌椅板凳和碗筷搬五套到小桥仓库；②将小桥周围的敌情了解清楚，加以控制；③不准生人在仓库进出，要切实保障安全。并嘱咐：“既不要打听消息，也不要乱讲，如发现意外情况立即向区委报告。”接着中南公安部的同志向我询问了豹澥区周围两平方公里以内的情况，各阶层的思想动态，近期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我满有把握地回答说：“自五〇年镇反以来，镇周围的秩序比较安定，按理在近期不会发生意外情况。”“你能负责吗？”出于绝对保险起见，公安干部向我追问了可靠的程度。赵政委接过话头说：“黄显金同志参加过镇周围各乡的土改、复查、镇反

运动，情况比较熟悉。当然，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公安干部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最后他严肃地吩咐：“现在要将区周围的控制情况和各阶层思想动态作一次具体检查分析，回来再作汇报。”随即竖起右手的两个指头特地强调说：“要记住公安二字！”从赵政委那里出来，我越想越感到这个任务光荣而责任重大，我怀着紧张而又激动的心情，开始执行公安任务。

金秋的九月，天高气爽，三汊港湖面波光粼粼，鹭飞鹭立。这天，满怀翻身喜悦的农民正在田野上忙着秋收。上午九点，人们发现三辆轿车、一辆交通车和一辆中型吉普由远及近地朝豹潭开来。当五辆汽车同时在通向小桥的三叉路口停稳后，我发现从第一辆轿车上下来的就是李先念同志，他身穿一套灰色卡叽中山服，内穿白布衬衣，脚穿布底浅口鞋。他神采奕奕，兴致勃勃，一下车目光就注视到了与豹潭一水之隔的灵泉山，他信步走在桥堤上，操着浓浓的红安口音指着前面的远山说：“那里可是个好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农村比城市好啊！”在谈笑中，不觉到了小桥开会的地址。会场布置极其简朴，四张吃饭方桌，铺着宝蓝色旧竹布，这就是会议桌。座位除有几张“八仙椅”外，其余全是木条制的三人靠背椅。李先念同志进入会场后，坐在一把八仙椅上。会前间隙，他过细地询问了临时会议室这个仓库的建造情况，待参加会议的人员安坐后，李主席放下手中的茶杯，用征求意见的目光向大家说：“休息得差不多了吧，现在是不是开会了？”我和李德平同志的任务是在这里担任保卫工作，听说要开会了，我们就赶紧退出，执行巡逻任务去了。

会议于上午十一点半结束，在原地午餐。桌、凳还是开会用的那一套，五桌菜饭都是同一标准——六菜一汤，无酒，当端出最后一碗汤时，李先念主席用责备的口气说：“怎么弄这么多菜？搞点白菜、萝卜吃不蛮好吗！既节约省事，营养又丰富。何必搞几菜一汤，我们这样搞，会脱离群众的。再说国家现在还很

穷，我们不能搞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呀！”李主席的亲切教导，至今我还难以忘怀。饭后，李主席带着大家在镇上转了转，下午又继续开会。约到三、四点钟，会议结束了。在返回三叉路口的途中，不知是谁开枪打死了湖边上的一只鹭鸶，李先念同志听到枪声后，当即严肃地说：“这里到处都有农民在田里劳动，怎么能随便开枪呢？伤了人怎么办？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放枪！”

直到李先念主席和其他首长、随行人员都上了各自的车辆，安全地回省时，我才如释重负，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事后我常常想：那时是土改后不久，农村阶级斗争比较复杂，李先念同志却下到基层来现场办公，指导工作，使我们深受教育，特别是他不畏艰险，深入基层，关心群众和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策反记

许大鸣

武汉沦陷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三日深夜，按照鄂豫边区党委和天（门）汉（川）地委的部署，我们十几个共产党员，率领一支经过长期策反工作反复多次的部队——汪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十二师一六五旅和一六四旅一个团，开拔到汉阳县的丁家集，会见了等候在那里的新四军鄂豫边区挺进纵队参谋长张执一同志，将这支部队交给了党。

几天后，部队开到了沔汉湖畔的朝家集。李先念司令员特地从京山小花岭司令部赶来，在隆重的欢迎大会上，他亲自代表鄂豫边区党委和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司令部，把一面“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第四支队”的光荣军旗授给了我们。

这支部队是怎样经过长期策反后，才投向党和人民怀抱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奇特的合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进逼武汉，国民党军政首脑机关纷纷西迁。中共武昌县党组织通知各乡地下党员要丢掉对国民党政府的任何幻想，依靠我党各乡地下组织的力量，迅速以抗日乡村工作促进会的可靠成员、积极分子为基础，组织成立抗日游击武装，并决定，各乡抗日武装成立起来后，全部集中到县南梁子湖畔的保福祠，以便合并整编，统一行动。

我是在武汉沦陷后的半个月左右，奉命来到县南的保福祠的。没多久，我感染了痢疾，一天拉十几遍。党组织批准我回流

芳岭老家治病。在家养病期间，听说国民党军队溃退时在公路两旁塘堰水沟里，丢了不少枪支、弹药，一部分被大胆的群众拣回去藏在家里，一部分仍然躺在塘堰水沟里。我就动员乡促会积极分子说服群众把拾到的枪支、弹药拿出来抗日，并组织几个小组寻找、搜集，总共搞到了三十多条枪，还有一支左轮手枪，一挺轻机枪，子弹千余发。于是我们依靠这些武器，组织起了一支拥有四十多人枪的小股抗日游击队。

与此同时，流芳岭的著名绅士黄人杰，依仗势大财多，可以出条子向地方摊派“救国捐”。他拿出现大洋购买枪支、弹药，三、五块银元一支枪，一、二十块银元一挺机枪。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拉起了两百多人枪的队伍。黄人杰听说我回来了，还搞起了几十条人枪的队伍，派人通知我与他会面，想和我合作。黄人杰祖宗几代都是秀才，是书香人家，家里有十几石田，在流芳岭比较出名，是地方当权派，有号召力。大革命时期，他随着革命洪流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流芳岭地主阶级成立了一支地主武装团防营，装备十一条新汉阳造步枪，一千多发子弹。当时我父亲许保民是地下党区委书记，很想把这些枪、弹搞到手，拉起一支红军游击队到梁子湖畔打游击。恰逢这个团防营的头子孙斌臣七十多岁了，年纪老，身体衰，不想搞了。地方绅士主张另选新人。这样，我父亲就在流芳岭舒、田、周、刘四大姓中积极活动，使黄人杰当选上了团总。谁知他当上团总后就变卦了，见异思迁，随波逐流，不服从党的指示。党组织决定开除他的党籍，还没有来得及宣布，党内出了叛徒，黄人杰被国民党抓去坐了四年牢。后由他的舅父、老同盟会员杨经曲设法救了出来。从此他消极了一段时间。抗日战争爆发后，黄人杰想出来抗日，我父亲表示欢迎。他提出恢复党组织关系，我父亲没有同意。武汉沦陷后，黄人杰也去过保福祠。由于他不是党员，没有安排他担任什么职务。黄人杰看到党组织不大重视他，已经是闷闷不乐。

再加上党内某些同志政策水平不高，还不太懂得如何团结当地代表人物。党内干部王健明看着黄人杰腰里别着蓝光闪闪的二八盒子眼红，硬是设法搞去了。黄人杰气得两眼冒火，把袖子一甩说：“大鹏呀，我要走了。这些人要枪不要朋友，我不和他们搞了。”他一气之下，就在我患病之先回到了流芳岭，拖起了本地两百多枪兵的队伍。

我和黄人杰会面后，双方交换了意见，他首先提出把这两支队伍合起来，合作抗日。他之所以提出合作，目的很明显，他虽然拖起了这两百人的队伍，但大部分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是些乌合之众，没有一个可靠的懂得军事的帮手。他知道我打过游击，懂军事，想我和他合伙带兵作他的帮手，把这支队伍巩固起来，以图发展。我当时认为黄人杰虽然被开除了党籍，但被捕后没有做坏事，又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是统战对象，和他合作，设法把这支队伍控制起来，引向正道，可以增添党和人民的抗日力量。

就在这时，我党地下组织也在保福祠拉起了一支抗日武装。听说有两百多人枪，接受了国民党地方部队的番号，称“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直辖国民自卫队第一大队”，简称“梁湖大队”。他们来信要我把组织起来的四十多条人枪带到保福祠，并任命我为中队长。当时我真左右为难。上级党组织要我去，我不能说不去，我手中的枪兵是可以带走的，但黄人杰手下的枪兵是带不过去的。为了那支二八盒子，黄人杰一直耿耿于怀。我这一走，这两百多人枪不是争取不过来了吗？考虑再三，心里面舍不得放弃这两百多人枪，就托人带信给党组织，陈述我的看法和打算，并请求组织上派得力的干部来掌握这两百多人枪的队伍。可是，个把多月过去了，一直未得到党组织的答复。时间不等人，一九三九年春节，我和黄人杰的这两支队伍合作了，自称“鄂南人民抗日自卫总队”。黄人杰任总队长，下辖四个中队，我当了第一中

队中队长。黄人杰在地方有号召力，保甲长都听他的，条子一出，救国捐就摊派下去了。我懂得军事，在党内和进步群众中有影响。没有好久，我们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四百多人枪。

“受编不受调”

自从我托人带信给党组织后，一直没有回信。我和黄人杰合作后，又写信向党组织汇报了情况，仍未得到答复。后来听说上级党对我的“先斩后奏”很有意见，批评我不听党组织的话，跟着黄人杰跑，还准备开除我的党籍。为了消除党对我的误解，我又赶紧写第二封信向党组织详细汇报了我的观点和打算。后来，有人向党领导反映了我的真实情况后，党领导终于消除了对我的误解，重视了我的意见，并研究决定，同意我不回保福祠，并派来以县委宣传部长舒江皋同志为首的好几位党员，我记得有潘斌、沈池麟、蒋鹏武等人，参加搞部队的兵运工作，以便进一步掌握这支队伍。

舒江皋同志和我交换了情况后，着重讨论了如何消除县委与黄人杰之间的隔阂，统一抗日。先由我去试探黄人杰的口风，然后相机行事。

我来到总队部，试探地对黄人杰说：“黄先生，你听说了吗？县委在保福祠那边成立了梁湖大队，有两百多条人枪，还和日本人干了几仗，在梁子湖畔的保福祠、舒安一带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初步打开了局面。”

黄人杰听后颇为自满地说：“他们拉了两百多人枪，我们搞了四百多人枪，混得不比他们差。”

我接着说：“现在武汉日本人势力很大，抗日的力量各搞各，终不是个长远之计。我看，他们有两百多条枪，我们这边也有几百条枪，还是和保福祠县委王健明、舒江皋他们搞到一堆好，团结起来力量大。”

黄人杰有些反感地说：“算了吧，我才不缠他们哩。”我又进一步说：“不能那样看人，一切为了抗日嘛。同时，我们不是靠哪个人，而是靠阶级。你是老同志了，心胸应该放宽一些。不然的话，这样憋下去，彼此不合作，就有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彼此合作抗日，他们一大队，我们二大队，互相联系，有个么急事也可以互相支援。流芳岭背靠汤孙湖，地区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如果敌人从武汉出来‘扫荡’，我们没有退路，想转移也没有个位置。你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黄人杰听到这里不做声了，象是在考虑利害关系。

我一看有门了，就趁势说，“江皋来了，他很关心我们。别人主动找上我们的门，讲团结。是不是见见面，谈一谈？”

舒江皋也是流芳岭人，黄人杰的好友。黄人杰高兴了，站起来说：“好！他来了，接他吃餐饭，当面谈一谈也可以。”

我没有料到，一席话竟把黄人杰说动了。

酒席上，经过舒江皋的说服工作，黄人杰终于同意接受县委的编制，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团结抗日可以，人归我管，受编不受调”。舒江皋看到合并的条件还不成熟，先达到这一步就算不错，也就爽快地答应了黄人杰提出的条件。

又经过几天协商，黄人杰这支部队取消自封的“鄂南人民抗日总队”的番号，改编为“湖北省保安司令部直辖国民自卫队第二大队”，简称梁湖二大队，属武昌县委领导，黄人杰任大队长，舒江皋任大队教导员，潘斌任大队附，我仍任一中队中队长，沈池麟派到我这个中队当指导员，蒋鹏武当第五中队中队长。部队由黄人杰掌握，受编不受调。

经过初步整顿，黄人杰的部队一、五两个中队由共产党员掌握控制。其他中队下面班排里也发展了少数的共产党员。舒江皋同志后来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些党小组，加紧了开展兵运工作的第一步。

这支部队后来发展到九个中队。马湖的胡杰山的一百多条人枪也过来，加入了这支部队，使部队一下子扩充到千把人，七百多条枪，二十几挺机枪，成为武汉外围举足轻重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变统战为策反

正当党在黄人杰部队兵运工作有了初步基础的时候，局势却急转直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严重地威胁着敌人。日寇改变了对华的作战方针，用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办法对付国民党，以主要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力量。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六月，“平江惨案”发生了。一时反共叫嚣，遍于国中。我党在黄部虽然派进了几个党员干部，但不能左右黄人杰的政治方向。这时，黄人杰在国顽和日伪东挤西压，威迫利诱之下，左遮右挡，招架不迭，领着部队流动于流芳岭、五里界、覃公庙、豹子潭、梁子湖一带，日子很不好过。他开始动摇了，首先在国民政府鄂南专员李辉武那里受编，弄了块“鄂南保安司令部直属独立团”的招牌，他自己则当了团长。黄人杰这时还是脚踏两只船，他向我们解释说：“么办呢？为了解决军饷，为了求得生存，我在李辉武那里讲的条件也是‘受编不受调’。暗里，我仍然接受武昌县委领导。”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黄人杰的舅父杨经曲，也是流芳岭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黄人杰被捕坐牢，是他营救出来的。他既是黄人杰的长辈、又是黄人杰的救命恩人。黄人杰对他是感恩肺腑，言必听，计必从。杨年轻时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和董必武同志有过交往，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

策，大革命时当过湖北省财政厅秘书，后来又当过几任县长，在武昌县有较高的声望。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度受我党邀请，出面与我党派出的张执一同志一起主持过党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湖北省抗日乡村工作促进会”的工作，有一定正义感，脑子灵活，善于适应环境。他的口头禅是“自古难逃春秋笔，人生一世当留名”。“识时务者为俊杰”。

杨经曲的熟人中有两个国民党的官员，一个叫金龙章，一个叫汪步青。在汪精卫投降日寇，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影响下，金龙章、汪步青先后投敌卖国，当了汉奸。金龙章是皇协军的总司令，汪步青是汪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十二师师长。这两支伪军都驻扎在武汉外围。杨经曲看到黄人杰的部队在国顽、日伪夹缝中，处境困难，就帮助黄人杰于一九三九年夏投到金龙章部下，编为“皇协军鄂南独立旅”，黄任旅长。黄人杰在突然公开这一叛变行为时，还宣布，脱离武昌县委领导，断绝任何联系。

黄人杰这一叛变行为，遭到我党在黄部的党员和许多爱国士兵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教导员舒江皋，大队附潘斌，一中队指导员沈池麟等在一个深夜带着一中队的一个排不辞而别，只有我和五中队队长蒋鹏武等上十个党员留下来了。

眼看着党影响和组织起来的千把人枪的武装部队，将要投到敌伪的怀抱，成为敌人的鹰犬，我内心十分焦急。我抓住黄人杰叛国投敌的事实，和他辩论，黄人杰理屈词穷，说：“我只是借屋躲雨，不当汉奸。我把队伍开到‘三不搭边’（指日伪、国顽、我军三方）的汉阳去，摆脱他们的控制，争取独立生存。大鹏，我们还是一起干吧。”

“我的身份，不说你们也知道。干不干我还得考虑考虑。”我来了个缓兵之计，好向党请示今后的行动。

由于我没有立即答应和他们一起干，又由于我的中队被舒江皋拉走了一个排，黄人杰周围的一些反动家伙一个劲地在黄人杰

面前告我的状。什么“许大鵬不是个好家伙，他一家都是共产党。”什么“不能让他再带兵了，得防一手。”于是黄人杰就把我的一中队长职务免了，叫我到旅部当副官长。我根本没有去旅部到职，一天到晚背着手枪在街上闲逛，并叫心腹部下张志进代笔写信给县委，向县委报告说：舒江皋他们走了，把我们上十个党员留下来怎么办？黄人杰对我们不放心，免了我的职，但蒋鹏武还当着五中队长，手上还有百多条枪。我要是离开这支部队，黄部的枪就会丢光，不可能回到党手里。蒋鹏武也呆不长久，他是四川人，人生地不熟，黄部的那帮反动家伙肯定要搞掉他。今后怎么办，请县委指示。没过多久，县委派党员干部周竹轩、周玉龙从保福祠那边过来了。周竹轩跟黄人杰感情最好，是以私交关系来做黄人杰的工作的。周竹轩找到我后，就兴奋地告诉我，

“党中央派李先念同志来到湖北，组成了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新四军一到鄂中，就在应城魏家河、京山新街、襄花公路、以及应山、安陆等地打了几个胜仗，成立了四个团队，很快就要过襄河向江南发展了。”并说：“黄人杰的叛国投敌行动，党组织目前是无能挽回的。县委决定你们上十个党员仍然留在黄人杰部队里，相机策反，争取将黄部的人枪拉过来。”

我说“黄人杰现在不放我的心，免了我的中队长的职。”

周竹轩说：“我这次来就是做他的工作的。”

周竹轩找到黄人杰，对他说：“你把大鵬的职免了，不叫他当中队长带兵，将来挡风抵浪，你靠谁呀？你那么多的中队长，哪个能打仗？只有大鵬能给你挡个风，抵个浪。你为什么要免他的职？他对你还不忠实？当初保福祠那边要他过去，委任他当中队长，他不过去，一直跟着你干，对你忠心耿耿。你今天免了他的职，将来出个什么事，你考虑后果没有？哪个比大鵬靠得住？你的舅舅和其他亲戚都是中队长，虽然能控制部队，但不能打仗呀！”

周竹轩的一番话又把黄人杰的心说动了。恰巧这时第二大队